

回忆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情况(上)

●董逢甲

1944年农历8月中旬,八路军皮、徐支队由登封县的送表进驻临汝县大峪店地区后,利用各种形式向人民宣传八路军的各项政策和抗日主张,并到处刷写:“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抓丁、不拉夫、不派粮、不派款”“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大幅标语。部队所到之处,公买公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一、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我家住在临汝县大峪店西边的袁窑村,部队经过袁窑时,为了不打扰老百姓,他们不进村内,都在村外河滩里休息。

当时,一向被国民党、土匪、日本鬼子打骂吓怕的群众,听说队伍来了,立时就跑光了,村里只剩下几个跑不动的老人和病夫出来照应,给部队烧开水喝。按照常规,当兵的喝老百姓的茶水哪里还给钱呢!可是八路军一定要给钱,群众不收,部队不行,人们都觉得很稀奇。

有一天,部队到了马鞍庄村,当时,全村群众几乎跑光了,只有于培周的父亲于中平老人(70多岁)还在家中,部队首长对他说:“我们想在这个村做饭吃,老先生,能不能把群众找回来?”于中平老人看到八路军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就立即出村找回来一部分群众,帮助部队烧火做饭。部队首长皮定均司令员就在于老家中休息,战士把饭做好后,先给于老先生端一碗,他不吃,皮司令员恳切地说:“您这么大年纪了,您不吃,俺们怎能吃呢!”于老推托不过,只好与部队首长坐在一起吃了。从此之后,他见到八路军比待其家人还要亲。(临汝抗日县政府成立后,于老还当上了大行政村的村长。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皮司令员还给大峪公社来信,询问于老的情况,还说他是党员哩!)当时,没有在家

的群众,部队做饭用了他们的面,都一一过称,把钱放在面罐里,在菜地拔一棵萝卜,就把钱放在萝卜坑内。八路军这种爱民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子,大家都说:“八路军真好”“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二、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原在本村袁窑中心小学教书,1944年5月,汝州沦陷后,为躲避兵荒马乱,我整日东奔西跑不得安生。农历8月中旬,八路军解放了大峪店地区。八路军纪律严明、宣传抗日救国、伸张正义、处处为穷苦人民着想的正义行动,使我对共产党、八路军从内心里产生了热爱。我姐夫于培周经常带领欧阳景荣、党峰、梁济生等同志,在我家住宿吃饭。党峰同志为人非常谦虚、热情,他看我父亲在地里干活回来时,就赶忙上前接过锄头背回家,他见我父亲去担水,就连忙接过水桶去担水,军民彼此不分,亲如一家。为了安全,我还不间断护送党峰同志到马鞍庄去开会,因此,我也认识了张清杰、张立治、梁济生、刘波涛等同志。有一次,在路上党峰同志问我:“咱们要建立区政府,你说区长叫谁当?”我说:“现成的家。”他问:“是谁?”因为我当时在政治上很模糊,当即回答:“袁窑村的梁须臣,人家当过几次区长了,还是叫他干吧!”党峰同志说:“他不行”。我以为这是说闲话,也就不留心了。

1944年农历9月11日,在马鞍庄村于培周家里,我向党峰同志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请求,他当场表示同意,并愿作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说着就用铅笔划个表,让我填写基本情况。当时,张立治同志也在场,他们二人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因为那时正值战争年代,发展党员的手续简单,我就是这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三、争取“二梁”,共同抗日

同年9月上旬,皮、徐带领的部队从别处又迁回到大峪店一带。当时,从部队下来几位同志做地方工作,建立政权。我记得有欧阳景荣、党峰、梁济生、张清杰、张立治、刘波涛等人。他们均住在马鞍庄村于培周家里。为了争取袁窑村地绅梁小舟、梁须臣共同抗日,欧阳景荣、党峰二位同志在于培周陪同下,带着礼物到袁窑面见“二梁”,协商抗日救国事宜。我们向“二梁”提

出两个要求:一是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为八路军筹集军粮(当时,付给梁须臣一部分钢洋,委托他给部队购买军粮);二是亮明旗帜,共同抗日。这些要求,“二梁”很顺利地接受了。因为抗日是大义所在,无可言辩。再者,日本鬼子到他们村时,曾把他家的年轻妇女都糟蹋了,他对日本鬼子也有仇恨。此后,党峰同志还在梁须臣家里研究过建立抗日指挥部的问题,让他担任指挥。这一组织只是说说,并未实施,可是梁家借着这个名义,把人员枪支组织了起来,他们站岗放哨,日夜巡逻,为我们也做一些有益工作。

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特务,装扮成一个拾粪的,到袁窑村刺探军情,大家都不认识他,一审问,他承认了,梁小舟出于义愤,立即把这个坏蛋枪毙了。

四、建立地方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10日,临汝县抗日县政府和大峪店抗日区政府在棉花村秘密成立。经过一段时间宣传发动,对外公开时机成熟。11月13日,我记得是在大峪乡棉花村占选家里召开的建立抗日县政府筹备会。会上,由我起草、书写成立抗日县政府布告。当时,皮司令和其部下35团团长王诚汉以及欧阳景荣、党峰等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准备去大峪店召开成立县政府的大会,但是大峪店地主武装头目李聚五,带人在蜜腊山南脚(角)把守,不让我们通过,他们距棉花窑只有二里多路,不时向我们开枪威胁。为了顺利通过,领导派部占选到对方说合。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李聚五仍是不让我们通过。当时,王诚汉团长带着部队在山下石窑沟(距敌人只几十步远)等火了,他将自己穿的小皮袄脱下往旁边一摆,一声未吭,一枪未发,全体人员跟着他往山上猛冲,李聚五见势不妙,连大峪店街也未敢回,顺着石板河一直跑到山下一五张村占区去了。

当天,部队住在大峪店,第二天上午,在大峪店召开地方绅士、保、甲长及群众大会,宣告临汝县抗日政府和抗大峪店抗日政府正式成立,党峰同志任县长,我为区长,王金柱、孔庆祥任区财粮助理。会后,县、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均又回到马鞍庄村,住在于培周家里。我记得,党峰

同志还以县政府名义下聘书,聘请梁小舟、梁须臣为县参议员。

抗日县政府成立之后,对持枪投敌的李聚五按汉奸处理,县政府查封了他的全部财产。县、区地方政权建立之后,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抗日县政府和抗日区政府成立的重要意义;二是教育群众不向日本鬼子和伪军交粮、交款、出人、出物;三是建立村政权,即大行政村,根据地区情况把几个自然村划为一个行政村;四是建立区干队和民兵组织,保卫抗日根据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打击日伪土匪等反动势力;五是组织拥军工作,安置部队转移到根据地休息,并对医院伤员进行慰问等;六是建立其他抗日组织(如抗日救国会),发动组织群众捐献鞋袜,布匹支援部队,更主要是通过支前工作,密切军民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地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在大峪店抗日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马鞍窑、袁窑、十岭、青山后、辉泉、棉花窑、大峪店、许台等九个行政村。

2.组织了区干队地方武装,我任区干队长,王天一为副队长。区干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长为王天一、秦广善、赵德修、郭钊四人。区干队的武器,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到民间的。有的为本人所有,有的为地方组织的“联庄社”所有,都是经他们几个人组织起来的,区干队员均脱产,吃公粮。

3.此后,我在区政府所在地赵楼村,还建立起一支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区干队武装,高周为队长,武器全是部队留下的。区干队建立后,1945年2月,段子铺的日伪自卫队,企图摧毁我们区政府,他们从段子铺出发经小寨洼、稻谷田包围赵楼村。当时,十岭村公所给我们送信,我们立即带领区干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4.区干队和民兵组织基本健全后,于1944年农历腊月间,党峰同志率领区干队和民兵去攻打日伪据点段子铺,解散了正在为日本鬼子修工事的民工,并缴获了日伪维持会几条枪,吓得日本鬼子龟缩在王湾寨上一直未敢出动。

5.开辟了枣树店、东安窑、中安窑、西安窑、于窑等十几个村庄抗日根据地。

6.1945年4月,在登封县西南部的边远地带,开辟了一个新区,建立了临汝县抗日政府第二区,区政府设在送表附近和沟村,任命李清韶为区长,邵先礼、张维典为副区长,栗全来为区干队长,龙窝村的张庆彦为区财粮助理。管辖东起贯宝山,西至白窑,长六十余里的地区。

7.建立临汝县独立团。1945年农历正月月底,2月初,县政府成立了独立团,党峰同志兼政委和团长,陈其双同志为副团长,牛占元同志为副政委,县独立团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在赵楼建立的区干队,从部队下来的李本同志担任区农会主席,裴建国同志是区工作队的成员,还有两位老干部记不清名字了。

8.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什么叫倒地运动?1942年(即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灾情惨重,农民为了活命,变卖庄田、坡地地荒,地主阶级用低廉的价格买去农民手中的土地,灾荒过后,国民党政府出布告称“凡是卅一年灾荒出卖的土地,可以拿钱赎回”。我们借助国民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倒地,因此就叫倒地运动。当时李木、裴建国等同志到区政府后,成立了工作组到各行政村组织建立农会,选举倒地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在倒地运动中,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政策,如买地家土地少,卖地家土地多,规定地少的户,不倒给地多的户。当时我们地方政府除了组织民兵和敌人打仗以外,倒地成了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减租减息工作,没有开展起来。

地方政权建立起来以后,通过几个月的武装斗争,大峪店这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巩固起来。当时,部队的后方医院,由登封县的马峪村搬到临汝县西边的路泉村,这个医院分散在群众家里,可住100名左右的伤员。另外一支队的后勤供给处,设在熬子坪村,有几十个工作人员。他们在那里用缝纫机做军服、修枪支。当时,盘踞在临汝县城和登封县城的日本鬼子,不时向根据地扫荡,但很少能够进入根据地内。



对话鹤鸟的精灵

●彭忠彦

和鹤鸟的精灵对话,在河南博物院——陈列中山寨出土的十孔骨笛前。

顶礼膜拜,你这7000年前的文明乐器,竟是汝海岸边女媧国鹤鸟腿骨的特作!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知道,当然知道——伏羲时期,我们共同栖居在汝水岸边,那里是女媧国的乐土。《世本·氏姓》载:“女氏,天皇封女弟媧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这条女性的中原河流因其在女媧氏的封地而得名“女水”,也称汝水,汝州又因汝水而得名。《世本作篇》云:“女媧作笙簧。”笙簧就是“笙”,“簧”是笙里发声的薄叶,使笙能发出美妙的音乐。笙是由十三根芦管插在半截葫芦里做成的,因此又叫“葫芦笙”。据传,这是因为女媧和伏羲曾经在葫芦里避过洪水灾难,造葫芦笙以铭之。

君自笛乡来,方晓鹤鸟情。

晓得,晓得——埋名鸟国君莫笑,古来鹤鸟几留名?同为大型涉禽,以嘴长、颈长、腿长著称的同类,都被掩埋于岁月的风尘中,一名不惊。唯独你,来自女媧国的一只鹤鸟,腿骨为笙肇始远古音乐文明,从而名扬寰宇……

水有缘,树有根,人有祖,乐有谱。我作为鸟类王国普通一分子,献身骨管定音器名扬世界乐坛,怎能忘怀音乐祖神——圣母女媧的恩典?在音乐鼻祖媧皇的教化下,汝水岸边的“中山寨人”雄风勃勃,开始制造十孔骨笛,超越贾湖骨笛的一种定音器。材质成了大事,在鹤与鹤鸟之间终于选择了鹤骨。又从数以万计的鹤鸟中,有幸选中了我。幸福的我疼痛着、甜蜜着接受乐匠的斧锯刀砍、打孔和雕琢。不知经历多少次磨难,终于成就了我——中国最早的骨质定音器。这笛,已具备十二平均律的十个音,在遥远的新石器时期,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辅助下,能如此精确地计算出音孔位置,再次彰显了女媧国先人伟大的创造和智慧,堪称音乐和数学史上的奇迹!

别了,骨笛——鹤鸟的精灵!你静卧一隅,昭示一方文明。文化一脉传承。中山寨古笛和女媧发明笙簧形成了互相佐证的文化链条。从女媧在汝水流域发明笙簧,肇始远古音乐文明,再到中山寨人在汝水流域制造骨笛,重续7000年前的音乐辉煌,这是文化传承的结晶,绝非偶然之兴。



梁杨子2019年12月24日摄于大峪镇王台村

牵着牛儿奔小康

●王永宾

《诗经·汝坟》遐思

《诗经》里的第十首诗——汝坟
是在此地破土发芽的
华夏文化的参天大树
让这座秀丽的古城
在神州大地所有的城市中矗立着
历经几千年的沧桑
依然焕发勃勃生机
厚重的文化底蕴支撑起了悠久的历史
这个城市名叫:汝州

《诗经》里的第十首诗——汝坟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绽放蓓蕾
朝着浩瀚的苍穹谱写生命的赞歌
走进这个古老的小城
最好的导游是手上拿着的《诗经》
伴你走近汝河畔一个采撷伐薪的妇女
对丈夫如饥似渴的思念
让她的内心荡起阵阵涟漪
但默默的承受和担当
让夫妻的浓情蜜意最终服从保家卫国的规矩
这就是中华女性自古以来的伟大和坚毅

·连载·



《正定古今》封面的三幅画也是习总书记审定的。上面一幅是大佛寺大悲阁的大佛,观世音菩萨画像;底下两幅,一幅是正定地图,一幅是正定工业发展图,预示着正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前进,发展得更快更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他和正定以及您本人还有哪些联系?

系?

张五普:习总书记离开正定以后,长期关心编写《正定古今》的事情,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他走了以后还经常在不同场合讲到正定。我印象中,他有一次在河南看小麦的时候讲到了正定,还有一次在北戴河开会时也提到了正定。

他离开正定以后,同在正定共事过的很多同志都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跟他也一直有联系,他给我寄过书,寄过贺年卡,还寄过鼓浪屿风光的明信片。2004年春节,他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他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这本书内容很扎实,写作风格也很好,对理论有深入探讨和认识,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当前实际联系很密切。我读了这本书,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大启发。我深深感到,习总书记真正是继承

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优良思想、优良作风。

“他说话做事做人都踏踏实实、诚恳恳”

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实实、诚恳恳。

采访对象:江山,1946年生,江苏武进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北省作协会员。

1974年与时任河北省副书记的吕玉兰同志结婚。2006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

室
采访组:江山同志,您好!您的爱人吕玉兰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委班子共事。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吕玉兰同志。

江山:好的。我的爱人吕玉兰是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40年出生。1955年高小毕业的时候,她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城里当工人或继续上学。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她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东留善固村风沙很大,她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治理了村北上千亩沙荒地,还到家家户户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她很快就成了群众心目中的好带头人,担任了村里的

“新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年仅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村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1958年入党,196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6月,她在《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人生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都转载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她受邀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还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1969年,她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随后在全国推广。1971年,她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任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9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未完待续)